

“不再流泪的洛特曼”:洛特曼在西方*

李 薇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300)

摘 要:60年代中后期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代表洛特曼以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身份进入西方学界视野。90年代后洛特曼面临结构主义身份认同危机,西方学界开始致力于放大其理论中解构主义因子,塑造更为开放、跨界、全新的“洛特曼”。通过描摹洛特曼在西方语境置换、视域更迭中呈现的独特镜像,不仅可以启发洛特曼后续研究,也可窥见西方学界对外来理论阐释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立场。

关键词:洛特曼;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1-0118-04

在西方,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Tartu—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与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哲学小组是少有的得到西方学界高度重视的苏俄学术遗产。据统计,洛特曼学术著作及研究专著在西方出版不多,“发行量极小,通常在千册以下”;^{[1]346}“根据索引数据库(*ISI Web of Science Citation Index*),只有66条参考文献来源于《思维世界》,38条源于《文化与爆炸》。”^{[1]16}洛特曼的国际声望源自前期结构符号学论著,蜚声海外的时代正值结构主义鼎盛期。但“较之雅各布森、巴赫金,这位思想巨擘,始终未能成为西方学界的时尚达人。”^{[1]346}

199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跨学科语境中的洛特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以《洛特曼与文化研究:扩展与交锋》(*Lotman and Cultural Studies: Encounters and Extensions*)为题出版。后记《没有眼泪的洛特曼》中提到“洛特曼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没有感伤、怀旧和眼泪的时代”。^{[1]348}此言简要勾勒出“西方洛特曼”在语境置换、视域更迭中独特的镜像。

一、生成:作为结构主义者的洛特曼

60年代中后期洛特曼以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身份进入西方学界视野。1964年在意大利《*Marcatre*》刊登“苏联符号系统结构研究研讨会”的报道。同年法国期刊发表洛特曼作品。1967年意大利《*Strumenti Critici*》发表洛特曼的《苏联文学理论研究的准确方法》,同年出版塔尔图学派文选。

1968年,法国《*Tel Quel*》(第35期)刊载克里斯蒂娃引介洛特曼的文章。克里斯蒂娃指出“塔尔图学派符号学家为了建立第二模式系统应用了符号逻辑,数学概念和信息论概念”,^{[2]32}并将之称为符号学实践的理论工具。同年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诗学讲义》在美国出版,美国版序言中称之为“对文

* [收稿日期]2014-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W004)“当代文论与‘去黑格尔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2XJC751003)“超越现代与后现代——德勒兹差异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2CZW10)“文论创新与经典重译”

[作者简介]李薇(1981—),女;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美育实践研究。

艺学的一个重要贡献。”^{[3]28}1968年1月21日,国际符号学会在巴黎成立,洛特曼缺席当选副主席,同为副主席的还有雅各布森。

1973年,洛特曼以俄文、英文两种文字发表《文化符号学研究纲要》。此论文引起了西方学界强烈关注。格雷马斯、雅各布森、艾柯等纷纷撰文,做出积极回应。同年法国出版洛特曼第一本译著。

1977年,洛特曼当选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英译者罗纳德·布鲁恩在前言中评述洛特曼在本土的遭遇时,指出“现有的评价尽管多是贬低洛特曼的,但大多数苏维埃批评家都不得不承认:在文学研究方面,洛特曼的一些见解极为独特。”^{[4]1}

1977年,西方学界第一本洛特曼研究专著英国牛津大学安·舒克曼教授撰写的《文学与符号学——尤里·洛特曼作品研究》出版。专著主要以洛特曼结构文艺符号学为研究对象。

1984年,美国《密歇根斯拉夫文集》第10期刊载关于洛特曼的系列论文。1986年洛特曼当选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荣誉院士。1987年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称《艺术文本的结构》涉猎广泛,表述清晰,堪称时代巨著之一。^{[5]253}1989年洛特曼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从60年代至80年代西方洛特曼接受史来看,按照艾德纳·安朱斯的说法,西方学界对洛特曼的认知建立在洛特曼60、70年代的作品上,得出洛特曼理论即多重二元符号构成的模式系统的结论。在此便涉及接受语境的期待视野。60、70年代正值西方结构主义演变至解构主义,文论范式重大变迁的交接点。布洛克曼在《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中,业已宣告结构主义的终结。书中专开一章“今日结构主义”开篇即言:

结构主义自从在西方20世纪充满变化和危机的六七十年代达至高潮之后,今日已不再成为论辩主题,并因此也未在词典的任何重要条目中被讨论。这一事实反映了这一主题今日存在的背景。^{[6]115}

洛特曼被其描绘为现代俄国结构主义代表。威廉·米尔斯·托德认为“洛特曼1970年问世的《艺术文本的结构》,1977年西方才介入,显然已错过了最佳时机。此时西方学界已被法国后结构主义和德国接受美学攫取了眼球。”^{[1]346}

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学者对洛特曼的身份书写,仍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予以命名,置于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轨道,未导入皮尔士三元论符号学研究方向。身披结构主义外衣的洛特曼,从最初备受重视,到后来被渐疑渐弃,便不难理解了。

伊格尔顿将洛特曼归之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流派,指责其有反人文主义、本质主义、反历史主义倾向。伊格尔顿引述巴赫金对话及复调理论、德里达文本观、巴特后结构主义转向,指责结构主义无视情境,忽略言语。他认为语言并非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派假设的呈现稳定状态,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明晰,包含对称单位的结构。而结构主义回避价值判断,由于主观性是无法根除的,故其试图以“科学的贵族”异化的科学实践理论规避“人文主义”谬误的努力注定失败。最后伊格尔顿指出结构主义已属强弩之末,在巴黎一路失势,在欧洲已经过时。“我们已经从结构主义时代发展到后结构主义统治时期。”^{[7]195}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语言与言语、人文与科学之争,与俄国学界对洛特曼的质疑点相似之外,结构主义被解构主义替代,结构主义失势成为了西方洛特曼身份认同的最大障碍,西方文论变迁对洛特曼的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时还应看到,受制于客观条件,“苏联对洛特曼作品向西方世界的文化输出控制严格,以至于‘西方洛特曼’仅为‘俄国洛特曼’的暗影呈现。”^{[8]XIV}特定时期,洛特曼二元论者的身份,不公平地在西方语境下边缘化。安德烈亚斯和杰瑞米也指出洛特曼学术效应在美国不及法国结构主义,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他的著作出现在法国结构主义作为主流思潮席卷美国之后,而其理论中混杂的俄国历史学,使得外界亦很难深入。^{[1]6}

值得一提的是,洛特曼除了受到解构主义范式冲击之外,还受制于另一支以门罗为代表的分析美学制约。分析美学是英语世界的主流。门罗在1951年3月《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41年创刊)IV发表《作为科学的美学:它在美国的发展》。其专著《走向科学的美学》于1956年再版。而1959年6月《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XVII刊登“信息理论与艺术”学术讨论会论文。分析美学的路径异于洛特曼代表的

俄国文论传统,对美、美的本质等加以悬置消解。

二、流变:作为解构主义者的洛特曼

从历时线索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的“西方洛特曼”面临从结构主义到非结构主义的身份转变。西方学界视野聚焦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范畴,着力挖掘其理论解构主义因子,洛特曼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一方面,源自洛特曼理论本身的张力和复调性逐渐呈现于西方学界。以艾柯对洛特曼的评价为例。1990年,艾柯为洛特曼《思维的世界》英文版作序中提到:

洛特曼认识到,尽管文本的信息阐释建基于语言代码,但并不代表文本或文化就是代码。他意识到事实上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单一的代码,而是并存多种形态的代码。在我眼中,洛特曼处理这个问题,已超越结构主义独断论,提供了更为复杂和清晰的入口。相对于结构主义过于死板地将代码与信息予以对立,洛特曼圆融地解决了语法学与文本学的差异。^{[9]X-XI}

克里斯蒂娃在1994年《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上撰文《关于洛特曼》(On Yury Lotman),指出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洛特曼理论具有预见性。其文本观已超越狭隘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克里斯蒂娃以自己的“互文性”概念为参照,指出洛特曼“第二模式系统”理论注重互动交流,在改造传统逻辑、抵抗独断主义上取得的成绩。^[10]

另一方面,西方文论范式转换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在“西方洛特曼”身份认同上清晰可见。艾德纳·安朱斯以皮尔士、西比奥克和雅克布森为参照,阐述洛特曼如何兼容结构主义与非结构主义理论。

199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跨学科语境中的洛特曼”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深入揭示了洛特曼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二元论”(post binary)的关系。当前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后现代话语向历史领域平移等成为理论阐释的重要背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12篇论文,涉及符号学碰撞与陌生化伦理学、政治现实和修辞界限、自我反思与地下党派、符号的自我陈述、日常谈判五大领域,分别从不同角度,积极展开洛特曼与吉尔兹的“深描”、洛特曼戏剧治疗理论与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表述、塔尔图文化

人类学理论与玛丽·道格拉斯等西方理论之间的对话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集中没有一位是专门研究洛特曼或与洛特曼亲近的学者。他们仅“借贷”(credit)^{[1]347}洛特曼部分思想作切片分析。威廉·米尔斯·托德将之解释为人文科学较之自然科学具有这样的灵活性。他以弗洛伊德为例,指出弗洛伊德进入阐释学、相对论、接受美学、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与其原初医生形象大相径庭。同样道理,尽管文集的研究范畴已远远超出洛特曼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认为:

一旦将洛特曼早期文本置于新的语境,如文化、政治、性别、身体、社会等,其呈现出来的意识多样性、多重视角和多变的形式主义,如同弗洛伊德一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新时代衍生新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也许从目前文化研究转向美学或深层次的形式主义,但文集预示着在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中,洛特曼思想均有一席之地。^{[1]349}

2003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艾德纳·安朱斯《与洛特曼的对话:语言、文学、认知中的文化符号学》,研究侧重于洛特曼后期文化符号学思想。共分三部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文本中符号学空间结构、作为认知科学的符号学理论。研究路径上分别从理论内涵和文本实践切入,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进行内缘清理和外缘调整。艾德纳·安朱斯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其理论渊源、演变与发展等命题,特别是对核心概念文本、符号域等重要领域有详尽的论述和深入的发挥。在对洛特曼文化文本阐释上,以雅各布森和西比奥克的沟通模型为参照物,凸显洛特曼理论价值。同时辅之以个案分析,展示出洛特曼理论运用于布尔加科夫和扎米亚京文本中独特的诗学风貌。艾德纳·安朱斯通过对洛特曼理论的实践性解读,为洛特曼理论的合理运用提供了方法论范式,揭示了洛特曼理论深远的现实意义。

简言之,当前洛特曼西方接受史呈现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研究内容上,偏重于文化符号学。按照李幼蒸的分析,将洛特曼划分为重科学式系统建构的符号学和重文化史个案描述分析的符号学,后一类研究更受西方学者青睐。较之客观中立的符号学方法,文化符号学具有明确的意义论和价值目标,归为“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康澄总结西方对洛

特曼的研究兴趣,也是在于洛特曼理论诞生在单一意识形态环境,但又超越此环境。^{[11]13}如《前苏联政治话语与政治团体的创造》《国家政权、霸权、和记忆:洛特曼与葛兰西》《伊斯兰现状中对伊朗过去的诱人回归:是洛特曼二分式的帮助?》等系列文章均热衷于阐发洛特曼理论中的价值观。其二,研究方法上,偏重于外部研究。套用霍尔理论,不是“洛特曼是谁”或“洛特曼从哪儿来”的问题,更多的是关注“洛特曼会成为谁”“如何再现洛特曼”以及“怎样再现洛特曼”。对洛特曼的追问,“他是谁”的传统本体论研究范式,已置换为“他可以是誰”“他将成为谁”等将对象重新语境化的叙事模式。

应该说,西方洛特曼研究将洛特曼理论放置于世界文论语境中,在思维范式几重更迭的大格局中探讨洛特曼的出场路径,发掘其价值与意义,颇有启示意义。

安德烈亚斯和杰瑞米指出,洛特曼并未直接使用“话语”这一关键概念。但鉴于洛特曼后期著作均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使用“话语”较之洛特曼本人使用的“代码”“信息”“文本”“语言”^{[11]8}更能体现洛特曼对语言矛盾功能的敏锐。而威廉·米尔斯·托德更为直接地道出,西方学界乐于从洛特曼原理论中切片并将其放置于新语境,塑造更为开放、跨界、全新的“洛特曼”。可见,西方洛特曼研究体现出更为开放的跨界意识。研究题域广阔,方法多样,善于从洛特曼理论中汲取精华,激活洛特曼恢弘的文化视野下理论具有的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史、文化史等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以此击破文艺学学科壁垒,打破各自为政的学术划界,寻求学科间研究的有机联系。

但若仅将视线停留于洛特曼学术观点表层,截取片段,不深入其中,剖析其理,研究中存在着内在的破缺与脱节,势必遮蔽洛特曼思想深层的背景、意义及其内在勾连。洛特曼学术价值未能真实地

全然呈现。附着式、贴标签式、表层描摹式均会不同程度抹杀洛特曼的历史功绩。

总体而言,学者理论的适切性、西方文论的话语场、苏俄文论的接受史等多维力场形成了布尔迪厄所谓的场域。多种视角交叉呈现,多重权力互动角力,固然增加了“西方洛特曼”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对在历史和逻辑中透视西方学界对外来理论阐释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立场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 [1] Andreas Schönle. Lotman and Cultural Studies: Encounters and Extensions [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 [2] Julia Kristeva, Josette Rey-Debove, Donna J. Umiker. Essays in Semiotics [M]. Hague: Mouton, 1971.
- [3] 彭克巽. 苏联文艺学学派[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4] 洛特曼. 艺术文本的结构[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 [5] 让·伊夫·塔迪埃. 20世纪的文学批评[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 [6] 布洛克曼. 结构主义: 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7] 伊格尔顿.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8] Edna Andrews. Conversation with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2003.
- [9] Juri M.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0] Kristeva, J. On Yury Lotman [J]. PMLA 1994(109).
- [11] 康澄. 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杨睿)

“No more tears of Lotman”: Lotman in the West

Li Wei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300)

Abstract: In the 1960s Lotman came into the Western academics perspective as structuralist semiotician. After 1990s, Lotman faces structuralist identity crisis. Western academics committed to enlarge deconstruction factor in its theory to shape a more open, cross-border, “Lotman”. By tracing Lotman in the West, It’s helpful not only to inspires follow-up study on lotman, but also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n foreign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by western academics.

Key words: Lotman; Structuralism; Destructuralism; Identity